

德藏吐鲁番文献中的宋诗习字残片

林 珊

在德国所藏的吐鲁番文书中,编号为 Ch.3800 和 Ch.3801 的两个残片为同一写本,观其格式应属习字文书^①。前者分三行写“香入幽”三字,每行各四遍;后者分四行写“月明孤斟”四字,每行各六遍。两习字残片所抄为一首宋诗,其原文为:“卜居近流水,小巢依嵌岑。终日数椽间,但闻鸟遗音。炉香入幽梦,海月明孤斟。鹧鸪一枝足,所恨非故林。”^②

一、习字宋诗的作者

这首诗被同时收在了苏轼和秦观的作品集中,在前者为《雷州八首》第三首,在后者则为《海康书事十首》第三首。《吐鲁番文书总目(欧美收藏卷)》定此两残片所抄为苏轼《雷州杂诗》五首之三,似可商榷。

清人查慎行在其《苏诗补注》中指《雷州八首》的作者应该是秦观而非苏轼,“《雷州八首》本秦少游作,‘粤岭风俗殊’、‘旧时日南郡’二首今载《淮海集》中,乃《雷阳书事五首》之二,‘白发坐钩党’等六首《淮海集》中《海康书事十首》之六,不知何以窜入公集,因仍踵讹,久而不察,所当亟为删去者也。”其理由为,《宋史·秦观传》载秦观在绍圣初年再贬郴州,后徙雷州,徽宗时才“放还至藤”。而据苏轼的诗序云:“与子由五月十一日相遇于藤,同行至雷,六月十一日相别渡海。”可见其在雷仅仅一个月,而《雷州八首》诗中“多侨居此土因时纪事之语”,如“灌园以糊口”之类。且苏轼“六月渡海,七月初已至儋州,何当有‘篱落秋暑中’、‘黄柑遽如许’、‘海康腊己酉’、‘东风已如云’等句”。查慎行并以吕祖谦所编《宋文鉴》第二十卷“诗类”中“所选《海康书事》五首皆系秦作,不云东坡作”作为其证,断言该诗“为秦作无可疑者”^③。

①参见荣新江主编:《吐鲁番文书总目(欧美收藏卷)》,武汉大学出版社,2007年,第308页。

②此以《海康书事十首》之三为准。《雷州八首》之三作“卜居近流水,小巢依嵌岑。终日数椽间,但闻鸟遗音。炉香入幽梦,海月明孤斟。鹧鸪一枝足,所恨非故林。”

③查慎行:《苏诗补注》卷四一,《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集部五十“别集类”,台湾商务印书馆,1986年,第811页。

秦观的文集最早有他本人于元丰七年(1084)自编的《淮海闲居集》,但似未刊行,此后又有三十卷本,至明代犹存,但今已不见其本。现存最早的刊本为乾道九年(1173)高邮军学刊本,包括正集四十卷,后集六卷,长短句三卷,后于绍熙三年(1192)重修,订正了一些讹误。元、明、清所刊《淮海集》基本都本于乾道高邮军学本^①。今天我们在《宋集珍本丛刊》第二十七册中仍然可以看到绍熙重修乾道高邮军学本的原貌,其卷六便收录了《海康书事十首》,其中第三首,就是“卜居”一诗。可见自宋以来,这首诗就已作为秦观《海康书事十首》之三而收于《淮海集》中。

清人翁方纲《复初斋诗集》中《访遗直轩址》一诗写道:“至今雷州咏,不得归髯秦。”注曰:“秦淮海《雷州八首》今刻本误入苏集。”^②实则其说法有欠准确,因为秦观的作品中并不存在《雷州八首》这一诗组。同时,正如下文考察苏轼作品集及各种版本的东坡诗注要揭示的,苏轼的作品中并没有《雷州八首》这个诗组,而所谓《雷州八首》其实是南宋坊间书商攒书时窜入东坡作品集中的,由秦观两组诗中取八首而合成。

苏轼作品集在北宋有“东坡六集”,即《东坡集》四十卷、《东坡后集》二十卷、《东坡奏议集》十五卷、《东坡内制集》十卷、《东坡外制集》三卷、《东坡和陶诗》四卷,在南宋则有“东坡七集”,在“六集”的基础上增加了《应诏集》,其他无明显变化^③。其中《东坡集》“乃东坡手自编者”^④,当时已行于世。关于《东坡后集》,据曾枣庄先生和刘尚荣先生的考证,北宋刘沔曾经编录过二十卷的东坡诗文集,并由苏轼亲自审读过,该集所包括的内容应该是“苏轼晚年的诗文,即苏轼罢杭州知州任以后的诗文,也就是‘已行于世’的《东坡集》未收的诗文”。而后世所见的《东坡后集》当是在此集基础上增补了苏轼北归诗文编录而成^⑤。现在能看到的《东坡集》、《东坡后集》是收在中华书局所刊《四部备要》的《东坡七集》中的本子。该《七集》祖于成化四年(1468)吉安知府程宗新刊《七集》。据书前《重刊苏文忠公全集序》所述,明仁宗曾命工翻刻藏于内阁的大苏文集,但未及完工仁宗便“升遐”。程氏本则是以“宋时曹训所刻旧本及仁宗所刻未完新本重加校阅,仍依旧本卷帙,旧本所无而新本

①关于秦观作品的版本情况,参考毛凌文:《〈淮海集〉宋代版本源流考》,《文献》2000年第4期,第112-116页;周义敢、周雷编:《秦观资料汇编·序言》第二部分“版本目录考”,中华书局,2001年,第7-21页。

②翁方纲:《复初斋诗集》卷四,《续修四库全书》“集部·别集类”,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年,第1415册第392页。

③刘尚荣:《宋刊苏轼全集考》第一部分“苏轼全集源流简述”,《苏轼著作版本论丛》,巴蜀书社,1988年,第1页。

④胡仔:《苕溪渔隐丛话·后集》卷二八,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第212页。

⑤《宋刊苏轼全集考》第二部分“书目文献中的宋刊苏轼全集”,《苏轼著作版本论丛》,第9页。

有者,则为《续集》,并刻之”^①。该本于光绪三十四年(1908)又经影刊并校跋,成为《四部备要》排印本的直接依据^②。也就是说,《四部备要》版的《东坡七集》与宋版相比,主要的变化都发生在《续集》部分,其他六集的内容则基本保持了宋时原貌。笔者翻查了中华书局《四部备要》所刊《东坡七集》中的《东坡集》、《东坡后集》,均未见有《雷州八首》存在。

此外,文渊阁《四库全书》集部别集类存目中有《重编东坡先生外集》八十六卷,经考证,该《外集》的编纂当出自南宋人之手^③。据原编者《东坡先生外集序》称:“庶几观是集者,并前二集,则先生之文,无复逸遗之憾,而如上诸集皆可废也(指《东坡集》、《后集》以外的二十多种东坡作品集)。”则该《外集》是据当时传世的二十多种东坡作品集进行改编,以补充前两集的不足。此《外集》有手抄本在明万历年间(1573-1620)为康丕扬所得,交予毛九苞校订后,刻于维扬府^④。如今在《宋集珍本丛刊》中所能见到的《重编东坡先生外集》就是毛九苞“参考经史及先生《全集》、《志林》诸书,若原本、若誉本、若刻本,凡三历心目,订定讹谬”校编的^⑤。翻阅此本,也没有《雷州八首》。

可见,两宋时期已经搜罗编辑了较为完整的东坡作品集,而在当时编纂品质较高、收录诗文很全,也因此而能长久流传的《东坡集》、《东坡后集》加《东坡外集》中都没有《雷州八首》这样一组诗^⑥。此外,宋元的各种苏诗注本中均不见该组诗,也佐证了苏轼的作品中实际并不存在所谓《雷州八首》。

南宋嘉定六年(1213),第一部编年体苏轼诗注《注东坡先生诗》在淮东刊行,该书由施元之、顾禧注,施宿增广,并由陆游作序,也就是后人所谓《施顾注苏诗》,亦即“施注”本。该书经多方裒辑,在《增补足本施顾注苏诗》^⑦中已经能够得见宋代基本原貌,其中也没有《雷州八首》。

此外,二十五卷的《百家注分类东坡先生诗》最晚在南宋中叶已经出现了,此书由《中华再造善本》据国家图书馆藏的建安黄善夫家塾刻本影印,已经可以展示其宋代原貌。笔者翻阅该书,其中并未出现《雷州八首》。约在宋末元初,书肆又出现一部二十五卷的《增刊校正王状元集注分类东坡诗》,此书

①李绍:《重刊苏文忠公文集序》,《四部备要》第77册《东坡七集》,中华书局,1920-1936年。

②《宋刊苏轼全集考》第一部分“苏轼全集源流简述”,第3页。

③刘尚荣:《〈东坡外集〉杂考》,《苏轼著作版本论丛》第111页;余嘉锡:《四库提要辨证》卷二二,云南人民出版社,2004年,第1160页。

④康丕扬:《刻苏东坡先生外集序》,《重编东坡先生外集》,《宋集珍本丛刊》第20册,线装书局,2004年,第102-103页。

⑤《重编东坡先生外集》毛九苞序,《宋集珍本丛刊》第20册,第99-100页。

⑥除《东坡七集》以及《东坡外集》外,还有《东坡别集》,据刘尚荣研究,该《别集》实际上是对北宋“东坡六集”的改编本。见《东坡外集杂考》,第120页。

⑦施元之、顾景蕃合注,施宿题注,郑骞、严一萍编校:《增补足本施顾注苏诗》,艺文印书馆,1980年。

“增刊”了部分句解和刘辰翁的批点,在金、元、明三朝广为流传。北京大学藏有该书的元刊本,其中亦不见《雷州八首》。元、明时期还有一部题名《增刊校正王状元集注分类东坡先生诗》的书,亦为二十五卷,但不收刘辰翁的批点,不标“吕祖谦分类”,只署“王十朋纂集”。据研究,该书似利用南宋建本原版挖改,其典型代表就是建安虞平斋务本书堂刻本^①。查北京大学所藏该本,其中也不存在《雷州八首》。

现在所能见到收录有《雷州八首》的东坡作品集,主要有《四部备要》据成化四年版重刊的《东坡七集》之《东坡续集》以及文渊阁四库全书中的《东坡全集》。文渊阁本四库全书所收的《东坡诗集注》及《施注苏诗》也收有《雷州八首》。究其来源,皆为南宋坊间书商所攒之书,下文即对此一一辨析。

中华书局《四部备要》版的《东坡七集》之《东坡续集》中有《雷州八首》组诗^②,而正如上文所述,这一版本《东坡七集》之源,乃成化四年(1468)吉安知府程宗所刊的《七集》,当时以《东坡续集》取代《和陶诗》作为七集之一,而该《续集》中不仅包括了《和陶诗》,还包括了原来集中未见收录的诗文。据前引李绍序可知,此《续集》是程宗以其所得宋时曹训所刻旧本,与明仁宗翻刻内阁所藏宋本东坡全集未完新本重加校阅,将旧本无而新本有者编为续集。因此,这续集的来源就是明代内阁中所藏的宋版东坡全集。据研究者的分析,该内阁藏本应该就是分类合编的南宋建阳麻沙本《东坡大全集》一系^③。该本屡见称引,但其中已经是真伪杂糅。胡仔说:“东坡文集行于世者,其名不一,惟《大全》、《备成》二集,诗文最多,诚如所言,真伪相半。”^④这里所说的《大全》即麻沙本《东坡大全集》。陈振孙称:“麻沙书坊又有《大全集》,兼载《志林》、《杂说》之类,亦杂以颍滨及小坡之文,且间有讹伪剿入者。”^⑤因此,进入成化版《东坡七集》之《续集》中的《雷州八首》当正是南宋书商攒《东坡大全集》时误将秦观《雷阳书事五首》之二与《海康书事十首》之六组合为《雷州八首》而窜入其中的。这种错误在宋朝仅出现于麻沙本《大全集》^⑥这样的坊间攒

①刘尚荣:《百家注分类东坡诗集考》第一部分“源流考”,《苏轼著作版本论丛》,第54-56页。

②《东坡七集·东坡续集》卷一,第658页。

③参见祝尚书:《宋人别集叙录》卷九《东坡集》,中华书局,1999年,第424-435页;章培恒、徐艳:《关于五卷本〈东坡志林〉的真伪问题——兼谈十二卷本〈东坡先生志林〉的可信性》,《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学报》2002年第4期,第164-165页。

④《苕溪渔隐丛话·后集》卷二八《东坡三》,第211页。

⑤陈振孙:《直斋书录解題》卷十七,上海古籍出版社,2005年,第502-503页。

⑥除“东坡七集”的各种刻本以及《外集》、《别集》外,宋时的东坡作品集还有《南行集》、《坡梁集》、《钱塘集》、《超然集》、《黄楼集》、《眉山集》等二十二种,参考刘尚荣《〈东坡外集〉杂考》一文第二部分(第113-117页)对这些集子的考证,及祝尚书的观点(《宋人别集叙录》第424页),除麻沙本《东坡大全集》外,其中有可能窜有《雷州八首》的还有《东坡备成集》及《类聚东坡集》,但并无直接证据,且此二书流传远不及《东坡大全集》。

品中,而到了明以降则成为较为普遍的现象。

成化以后的各本东坡全集,基本都由上述成化本《东坡七集》出,并继承了其中舛误。亦收有《雷州八首》的文渊阁本四库全书版《东坡全集》,据其书前提要,为“国朝蔡士英所刊,盖亦据旧刻重订,世所通行”^①。余嘉锡先生据吴焯《绣谷亭熏习录》集部一所著录“《东坡全集》一百一十五卷,目录七卷,年谱一卷,此后人总汇旧本七集,分类编次”,认为“其书与蔡士英本体制卷数皆相同,则士英所据旧刻必此本也”^②。据祝尚书先生的考证,吴焯著录的明本百十五卷《东坡全集》与万历年间“合七集本而重加类次”的百十二卷本《东坡全集》凡例一致,当即据该本改编重刻。再追溯万历年间的《东坡全集》,其所祖《七集》当即成化版《东坡七集》,因此它继承了麻沙《大全集》里的错误,并为清代编订的《东坡全集》所接受。

收有《雷州八首》的文渊阁四库全书本《东坡诗集注》,所据底本虽亦号称成书于宋,但实为康熙三十七年(1698)新安朱从延据万历年间茅维改窜后的《百家注分类东坡诗集》重刻,该本将宋、元以来流行的二十五卷七十八类本,改并为三十二卷三十门,并自行补录了宋、元类注本原未收录的《和陶诗》以及包括《雷州八首》在内的见于《东坡续集》而类注旧本未收之诗^③。则其中之《雷州八首》亦来源于继承麻沙大全集错误的《东坡续集》。

文渊阁四库全书本《施注苏诗》也将《雷州八首》收于该书《苏诗续补遗》当中,据书前提要,该本是康熙年间江苏巡抚宋荦命人据其所得残本补阙而成,此二卷《拾遗》又是宋荦“摭拾遗诗为施氏所未收者,得四百餘首,别属钱塘冯景注之”而成。可见此《拾遗》所成甚晚,应该是清人继承明人之讹误,将《雷州八首》添补到施注苏诗原本之上。

正如上文之分析,“卜居”一诗实际是秦观《淮海集》的《海康书事十首》第三,一直收录在各种版本的秦集中;而宋代流行的诸种苏轼作品集及苏诗注本中,惟南宋麻沙《东坡大全集》窜入错误诗组《雷州八首》,直至明代,各种版本“因仍踵讹,久而不察”,将该组诗当作了苏轼作品的现象才普遍存在。

在出土的吐鲁番汉文文书中,明代以后的为数极少,编号 Ch.3800 和 Ch.3801 的这两件习字文书当亦早于明代,故其所记之诗在当时很可能仍是被当作秦观的《海康书事十首》第三而传播的。但鉴于麻沙本流传的广泛及活跃性,该习字诗也有可能因麻沙本《大全集》的影响而被作为苏轼的《雷州八首》第三在吐鲁番传播。

二、吐鲁番习字宋诗的来源

这首诗的写作时间是秦观被贬官外放至雷州期间,大约是元符元年

①《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集部四六“别集类”,第4页。

②《四库提要辨证》卷二十二,第1159页;祝尚书也持相同观点(《宋人别集叙录》第432页)。

③刘尚荣:《百家注分类东坡诗集考》第一部分“源流考”,《苏轼著作版本论丛》,第54-56页。

(1098)左右,则该诗的流传时间当为北宋末及南宋。翻阅《续资治通鉴长编》、《宋会要辑稿》、《宋史·高昌传》等史料,有关宋代与高昌回鹘交往的史料最晚止于绍圣三年(1096)^①,可见,绍圣三年后宋朝与高昌回鹘之间的官方联系十分薄弱,但即便如此,也不能够排除民间因商业、游历等原因带来的文化交流将该诗传播到高昌回鹘的可能性。然而更有可能的是该诗经由辽或金传播到高昌回鹘王国。

宋代诗歌在辽朝的传播一般是以诗集方式进行的,如《玉壶野史》卷七云:“祥符中契丹使至,因言本国喜诵魏野诗,但得上帙,愿求全部。真宗始知其名,将召之,死已数年。搜其诗,果得《草堂集》十卷,诏赐之。”^②据《宋史》记载,契丹使至宋,见市中有蔡襄所作《四贤一不肖诗》,“买以归,张于幽州馆”^③。苏轼的《眉山集》问世不久,范阳书肆便有了翻刻本。苏辙使辽亦称“料本朝印本文字,多已流传在彼”^④。辽与高昌回鹘之间也因朝贡贸易有密切的联系,据《契丹国志》卷二十一《诸小国贡进物件》记载,“高昌国、龟兹国、于阗国、大食国、小食国、甘州、沙州、凉州,已上诸国,三年一次遣使,约四百余人至契丹,贡献玉珠、犀、乳香、琥珀、玛瑙器、宾铁兵器、礪砂、萨哈勒贝、克必斯、敏达苏、博林、克必斯”,而“回赐至少亦不下四十万贯”^⑤。但是,秦观的诗集于北宋仅有其自编的《淮海闲居集》,成于元丰七年(1084),未收《海康书事十首》。此外,成于南宋绍兴二十一年(1151)的《郡斋读书志》又著录有三十卷的《淮海集》,但未注明刊行年代^⑥,不知成书、流行于何时,又不知是否收录《海康书事十首》,所以难以断言该习字诗是否作为秦观作品在辽代末年流传于辽地而传至高昌回鹘^⑦。而误收组诗《雷州八首》的《东坡大全集》成于南宋,因此可以排除习字诗作为苏轼作品经辽传播至高昌回鹘的可能性。

该诗从金朝传播至高昌回鹘的可能性与前两者相比则最大。金代取代北宋成为中原北方的统治者,原属于北宋的地区连同它们的文化一起被金代所接收。就诗歌而言,金代十分重视宋诗,宋诗对金诗的影响比辽代要大得多。金代的诗歌创作是以“借才异代”作为起点的,无论从诗歌的艺术范式、语言习

①上述宋代史料中有关于名为“回鹘”的政权之记载是关于甘州回鹘与宋代交往的史料;此外有关于“高昌”、“龟兹”的记载。田卫疆在其《高昌回鹘史稿》(新疆人民出版社,2006年)中论证,宋代史料对龟兹国与西州回鹘政权的内容其实都是对甘州回鹘政权的记载。

《宋史·龟兹传》中记龟兹与宋代交往最迟为绍圣三年。

②《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子部三四三“小说家类”,第327页。

③《宋史》卷三二〇《蔡襄传》,中华书局,1977年,第10397页。

④苏辙著,曾枣庄、马德富校点:《栾城集》卷四二《北使还论北边事札子五道》之一《论北朝所见于朝廷不便事》,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年,第937页。

⑤叶隆礼:《契丹国志》,上海古籍出版社,1985年,第205页。

⑥周义敢、周雷:《秦观资料汇编·序言》二“版本著录考”,第7页。

⑦写作该诗的北宋元符元年左右所对应的是辽代的道宗寿昌末年。

惯,还是意象系列、使事用典,由宋入金的诗人都把精深圆熟的宋诗直接“移植”到金源文化土壤中。金中期,即大定、明昌时期(1161-1195),是所谓的“国朝文派”崛起和形成时期,金诗创作虽初步形成了有别于宋诗的特有风貌,但仍然受到宋诗较多的影响。而到了金诗发展的后期,诗坛的主流便是“借宗唐以变宋”^①。可见在金中期以前,宋诗在金朝具有非常广泛的影响力,宋代诗歌在金朝也是十分盛行的。据《金史》记载,明昌二年(1191)四月己亥,“学士院新进唐杜甫、韩愈、刘禹锡、杜牧、贾岛、王建,宋王禹偁、欧阳修、王安石、苏轼、张耒、秦观等集二十六部”^②,可见当时苏轼、秦观的诗歌在金代应该已经较为流行。

同时,虽然高昌回鹘在耶律大石西迁时被迫依附于西辽,但同金朝还保持着密切的往来,包括高昌回鹘对金朝的入贡以及贸易。这都为金与高昌回鹘之间的文化传播创造了条件。如《金史·太宗本纪》所载:天会五年(1127)正月丁巳,“回鹘喝里可汗遣使入贡。”^③九年(1131)八月辛巳,“回鹘隈欲遣使来贡。九月己酉,和州回鹘执耶律大石之党撒八、迪里、突迭来献。”^④《金史·熙宗本纪》载金熙宗天眷元年(1138)八月癸亥,“回鹘遣使朝贡。”^⑤皇统二年(1142)七月甲午,“回鹘遣使来贡。”^⑥四年二月丁酉,“回鹘遣使来贺,以粘合韩奴报之。”^⑦海陵王贞元元年(1153)元旦,“宋、夏、高丽、回鹘贺正旦使,命有司受其贡献。”^⑧正隆元年(1156)闰十月,山陵礼成,“甲辰,回鹘使使寅朮乌笼骨来贡。”^⑨鉴于甘州回鹘已于1028年为西夏所灭,上述史料中的“回鹘”指的应该是高昌回鹘。

除官方的使者朝贡贸易以外,回鹘民间商人亦有对金贸易,如《宋会要辑稿·蕃夷》载:“回鹘自唐末浸微,本朝盛时有入居秦川为熟户者。女真破陕,悉徙之燕山,甘、凉、瓜、沙旧皆有族帐,后悉羁縻于西夏,唯居四郡外地者,颇自为国,有君长……多为商贾于燕,载以橐驼,过夏地,夏人率十而指一,必得其最上品者,贾人苦之。”^⑩这里的“四郡外地者”应当就包括了以吐鲁番地区为中心的高昌回鹘。金世宗大定中,“回纥移习览三人至西南招讨司贸易……诏

①周秀荣:《民族文化融合与辽金诗歌的发展流变——辽金诗歌与宋诗的关系研究》,南京师范大学硕士论文,2002年4月。

②《金史》卷九《章宗本纪》,中华书局,1975年,第218页。

③《金史》卷三《太宗本纪》,第56页。

④《金史》卷三《太宗本纪》,第63页。

⑤《金史》卷四《熙宗本纪》,第73页。

⑥《金史》卷四《熙宗本纪》,第79页。

⑦《金史》卷四《熙宗本纪》,第80页。

⑧《金史》卷七十六《太宗诸子传·宗元传附子究》,第1745页。

⑨《金史》卷五《海陵王本纪》,第107页。

⑩《宋会要辑稿·蕃夷四》,台湾新文丰出版公司,1976年,第7704页。

曰:此人非隶朝廷番部,不须发遣,可于咸平府旧有回鹘人中安置,毋令失所。”^①可见金国还有回鹘人集中居住的地点。在这种情况下,高昌回鹘与金国间的文化传播便有可能进行。

此外,经过学者的比对研究,发现吐鲁番出土的一些《大藏经》残片中,有一部分属于《金藏》^②。《金藏》于金熙宗皇统九年(1149)之际在山西解州天宁寺内开雕,刊版事业在贞元、正隆年间(1153-1160)最盛,至世宗大定年止。大定十八年(1178),潞州路的崔法珍将新雕之印本大藏经一藏,进献朝廷。此新雕藏经经版,不久便移到燕京弘法寺接管^③。关于吐鲁番的金藏流传情况,学者已经有所讨论,一些学者认为当地有整部的金藏,其中一些学者认为是高昌回鹘王家寺院所藏,或认为是元世祖时期颁赐的。党宝海则认为不应把视角局限在官方佛典的输入和元代版本上。在其《吐鲁番出土金藏考》一文中,作者引用一则回鹘文供养人尾题来论证金大定二十八年(1188)不颜绰黑曾在金中都弘法寺印制佛经,并传至吐鲁番,说明金代与高昌回鹘之间商人往返所带来的文化传播的可能性^④。很有可能正是随着高昌回鹘与金朝密切的经济文化交往,这首宋诗得以由金传播至高昌回鹘。

三、“宋诗习字”的文化意义

这两件习字残片与一般的习字文书不同,是将宋诗当作习字用帖来反复临写,这表明了虽然自9世纪中回鹘民族掌握了吐鲁番地区的统治权,而且该民族拥有属于自己的语言和文字,但是吐鲁番地区仍然延续唐西州以来较为发达的汉文化传统,并在交流中继续保持对中原文化的接受。

用诗歌作为习字用帖反复临写的现象在唐代西州就已经出现。经整理研究,近年新发现的吐鲁番文书中编号为2006TZJI:006和2006TZJI:007的两个残片组成的习字文书,正是隋朝诗人岑德润和同期另一佚名作者的两首五言古诗,该文书反映了西州教育体制紧随唐代热衷诗赋的文化步伐,说明吐鲁番地区高昌文化和汉文化的融合发展趋势^⑤。高田时雄指出,在高昌回鹘王国,《切韵》的权威地位仍然持续存在,并且回鹘语的汉字音写曾得到广泛应用,而这一定是建立在当地居民日常生活中得到长期使用的汉语方言基础上的,“回鹘语中形成的汉字音,都称得上是周边国家和民族中受汉语和汉字传统深

①《金史》卷一百二十一《忠义一·粘割韩奴传》,第2637页。

②④党宝海:《吐鲁番出土金藏考》,《敦煌吐鲁番研究》第4卷,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年,第103-125页。

③道安:《中国大藏经雕印史》,张曼涛主编:《现代佛教学术丛刊》之10《大藏经研究汇编》(上),大乘文化出版社,1977年,第132-133页。

⑤李肖、朱玉麒:《新出吐鲁番文献中的古诗习字残片》,《文物》2007年第2期,第62-65页。

刻影响最显著的产物之一”^①。此外,在高昌回鹘王国,《千字文》也仍然流行,交河故城出土的 Ch.3716 号文书抄写了 6 页《千字文》,其封面的题记写道:“天禧年十三,岁次辛未冬月之伴分廿三日,交河胜泉都通,兹无头《千字文》,有头实(?)将来,学习敬口执诵,不祸(获)咎。”^②在回鹘民族统治下的高昌王国在吐鲁番地区长久以来接受、使用汉文化的传统影响之下,继续保持对汉文化的接受和吸收,正是在此前提下吐鲁番地区才可能有将中原诗人的作品反复临写来练习汉字的现象。

目前所见吐鲁番最早以反复临写诗歌来习字的现象出现在唐西州时期,它有别于使用《急就章》、《千字文》、《开蒙要训》等常见蒙学教材,是伴随着当时爱好诗歌的时代新风尚出现的。Ch.3800 与 Ch.3801 这两件习字文书能够说明,这种以诗作为习字教材的方式一直延续到了高昌回鹘时代,成为吐鲁番地区较为特别的教育风俗。

在中原地区,蒙童的教材丰富多样,涉及的面比较广,因而分工也较为细致,有以习字为主的,如《三字经》、《百家姓》、《杂字》以及《性理字训》、《名贤集》等此期创新的教材,也有模仿《千字文》的“千字文体”《续千文》、《千文》、《叙古千文》、《稽古千文》等。此外还有以学习语言、写作为主的,如《神童诗》、《千家诗》等。这些蒙学诗集多是选取浅显易懂的名家名作,作为蒙童学习诗歌的教材。因此诗歌一般是作为教蒙童作诗为文的阅读教材而非习字教材来使用的^③。流传于吐鲁番的这首习字诗并非咏物诗,而是作者抒情之作,表达其贬官外放的郁闷,秦观以其词名为尤著,该诗并不算是著名作品,即便作为苏轼之诗来看,与童蒙诗学教材讲究收录体式对仗、通俗易懂易学的名家名作之原则也不甚相符。在南宋的《分门纂类唐宋时贤千家诗选》中收有苏轼及秦观之诗,但都是一些咏物、咏景或记事的作品;而在后来坊间流行署名宋代谢枋得的《千家诗》这样的童蒙诗学教材中就没有秦观的作品,苏轼作品也不出上述类型。因此这首宋诗出现在吐鲁番的习字文书中,应该不是作为中原某本习字或习诗教材流传的。那么,这种以诗歌作为习字用帖的现象当是吐鲁番地区蒙学教育的一个地方性特点,诗歌成为当地除《急就章》、《千字文》之外的习字教材。这种习字方式体现出了高昌回鹘王国对诗歌的喜爱,反映出当时对中原文化较高程度的接受和传播,说明即便是在回鹘统治的时期,吐鲁番地区也具有较高水准的汉文化。

作者单位:北京大学历史系

①高田时雄:《汉语在吐鲁番——以〈切韵〉残篇研究为专题》,收于氏著,钟翀等译:《敦煌·民族·语言》,中华书局,2005 年,第 31-33 页。

②《吐鲁番文书总目(欧美收藏卷)》,第 301 页。

③参见熊承涤:《宋代的蒙学教材》,《课程·教材·教法》1990 年第 5 期,第 20-23 页;王阳安:《宋元蒙学新编语文教材述评》,《山东教育科研》1994 年第 4 期,第 73-75 页。